

上编：隋唐五代

(581—960)

第一章

隋唐五代的政治兴衰

第一节 隋朝的建立和统一

一、隋朝的建立

北周武帝平定北齐，初步统一了北方。继位的周宣帝荒淫无能，北周政权出现危机，为外戚杨坚提供了夺权的机会。

杨坚出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般若寺，自称弘农郡华阴人，汉太尉杨震之后。其五世祖杨元寿北魏初已定居武川（今内蒙武川），其父杨忠跟随宇文泰入关中征战，屡立战功。西魏时授大将军之职，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大司空，封随国公，成为显赫的军事贵族。杨忠死后，杨坚袭爵随国公。

周宣帝的皇后杨丽华是杨坚的长女，从而使杨坚在关陇贵族集团中的地位格外引人注目，也引起周王室的猜疑。宣帝曾威胁杨后说族灭其家，杨坚惧祸请求外任。580年，周宣帝突然病死，内史上大夫郑译和御史大夫刘昉假传遗诏，引杨坚入宫，以都督内外诸军事名义掌兵权，不久又为左大丞相。继位的周静帝年仅8岁，由母后即杨坚的女儿辅政。北周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实际上都被杨坚掌握。

北周的三位总管，相州（今河南安阳）尉迟迥、郢州（今湖北安陆）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王谦同时起兵反杨，长安附近的周室诸王纷纷为内应。杨坚以韦孝宽、王谊和梁睿为元帅，分兵征讨。当时并州（今太原）总管李穆手握重兵，而并州是抵御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军事重镇，也是北齐、北周长期争夺的战略要地。尉迟迥提出与李穆联兵，遭到拒绝。李穆派其

子给杨坚送上一个熨斗，说愿杨坚能“执威柄以熨天下”^①，献上天子用的十三条环金带，并在军事行动中配合杨坚。从而使杨坚在军事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仅用 4 个月时间便削平了三方的反抗。

接着杨坚又诛杀了以赵王宇文招为首的一批试图反抗的北周宗室王公，权位进一步巩固，由左大丞相升为相国，改封随王。581 年，周静帝下诏禅位，杨坚登基，建国号隋，改元开皇。

隋文帝杨坚从矫诏入宫辅政到篡周建隋，前后不过 10 个月时间，后人论称“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②。杨坚改朝换代能够成功，得到了来自代北、关中、陇右的各族军事贵族和山东士人的支持，反映出自十六国、北魏以来，经历了长期动荡和民族融合之后，社会各阶层普遍希望恢复汉族政权的心态。具有关中军事贵族血统、皇后之父和幼帝外公身份，又与鲜卑等少数民族关系密切的杨坚，便作为最合适的人选，把握时机，成功地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

二、南北统一

杨坚建隋时，南方有建都于建康的陈朝和居于江陵一隅的西梁，北方是虎视眈眈的突厥。开皇元年（581）三月，隋文帝曾分别任命贺若弼、韩擒虎为吴州和庐州总管，筹划灭陈，九月又指派高颀统一指挥各军攻陈。但在翌年正月陈宣帝去世后却以“礼不伐丧”为名暂停对南方的军事行动，而真正的原因则是要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突厥。

开皇二年五月，突厥沙钵略可汗在其妻北周千金公主煽动下，以 40 万骑兵大举南下攻隋，自幽州（今北京西南）到临洮（今甘肃岷县）的隋军全线崩溃。隋文帝用严治关塞、重兵反击和施反间计等办法应付。不久，突厥内部生乱，又遭天灾饥疫，只得遣使求和，北周千金公主自请改姓，乞为隋文帝之女。开皇四年，隋文帝赐公主为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沙钵略拜受诏书，“称臣朝贡，请永为藩附”^③。第二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不再对隋朝构成威胁。北方形势改观，隋朝君臣的注意力再次转向了南方。

领有江陵沿江 300 里之地的西梁，原是西魏、北周的傀儡政权，隋文帝为避免树敌，受禅之初曾“遣使赐金五百两，银千两，布帛万匹，马五百匹”，对其进行安抚。不久梁主萧岿入朝，隋文帝给与破格礼遇，并选定萧岿之女为

^① 《隋书》卷 37 《李穆附李浑传》。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 15 《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

^③ 《隋书》卷 40《虞庆则传》。

^④ 《隋书》卷 79 《萧岿传》。

晋王杨广之妃，还撤销了监视西梁的江陵总管萧岿死后其子萧琮继位，隋文帝征萧琮君臣 200 余人入朝，留京不遣返，却派大兵戍荆州，摆出灭梁的阵势。隋军未至，萧琮的叔父萧岩等带 10 万人逃往陈国，西梁亡。

陈国此时在位的国君后主陈叔宝是个荒于酒色不恤政事的昏君。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伐陈诏，斥陈后主“自古昏乱，罕或能比”^①，并将诏书抄写 30 万份，遍撒江南。十月，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元帅，率八路大军 51 万 8 千人，在横亘数千里的长江沿线上，向陈军发起攻势。晋王杨广又以统帅身份向陈国执政的尚书令江总发出檄文，讲述了治乱纷争终归一统的历史大势，交待了隋朝“惟废伪主之身”，百官归命可以“身保荣贵”的政策^②。对隋文帝的诏书和晋王的檄文，陈国君臣全然不予理会，陈后主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军来者必自败”^③。都官尚书孔范附和说：“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④？君臣依旧歌舞不休，醉生梦死。

隋军的攻击首先由杨素在永安发动，他率水军出三峡东下，大张旗鼓吸引陈军主力。杨俊坐镇汉口，切断上下游陈军的联系。下游主攻陈国国都的战事，于开皇九年正月初揭幕，乘陈人朝会，在大雾掩护下，北军发动偷袭，贺若弼率军由广陵（今江苏扬州）渡江攻占京口（今江苏镇江），韩擒虎率军自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渡江袭取采石（在今安徽当涂境内），而后向建康合围。坐镇江北桃叶山（在今江苏六合东南瓜埠）的杨广，派宇文述率 3 万兵渡江夺取石头山（在江苏江宁西北），并遣杜彦与韩擒虎合军，屯兵建康城西南白鹭洲附近的新林。这时贺若弼已进据建康城东门外的钟山，形成对陈国国都的夹击之势。

陈后主拒不接纳将领们在攻守上争取主动的意见，迟疑多日，忽然决定倾建康 10 余万甲士于正月二十日出击，在城东排出南北亘 20 里的长蛇阵与隋军决战，旋即被贺若弼看出破绽，果断提前迎战，从薄弱环节孔范部突破，陈军支离破碎，宿将萧摩诃、任忠先后被俘投降。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避入景阳井中，被先突入宫中的韩擒虎部擒获。隋军人城后，斩贵妃张丽华于青溪，并斩施文庆、沈客卿等“五佞”以谢三吴。杨广又命陈后主致书高凉郡（治今广东阳江）太夫人冼氏，谕以国亡，使之归附隋朝，岭南诸州随之平定。平陈后共得州郡 130，县 400，人口逾 50 万。自西晋末年以来的南北分裂局面又

《隋书》卷 1 《高祖纪》。

《文苑英华》卷 645 《遗陈尚书江总檄》

《南史》卷 10 《陈本纪下》

④ 《南史》卷 77 《孔范传》

归于统一了。

三、平定南方的反叛

平陈后，隋将建康城邑宫室夷为农田，下令除毁民间的甲仗兵器，还派遣官员整顿南方基层政权。首先检责户籍，百家置里长，五百家置乡正，建立国家对农民的直接控制。其次是派苏威巡抚江南，推行“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儒家传统的五常之教。规定不分长幼，都要诵读，否则要受到责罚。这些旨在强化隋室思想政治统治的措施，伤害了南方人的情感，危及到南方土族豪强的权益。有人散布要把南人迁徙入关的流言，对隋朝的不满被煽动起来。开皇十年（590），婺州（今浙江金华）汪文进、会稽（今浙江绍兴）高智慧、苏州沈玄皆自称天子，署置百官。还有一些人自称大都督，其中不少是江南旧族豪酋。他们攻陷州县，杀死隋廷派来的州官县令，史称“陈之故境，大抵皆反。”

隋文帝命内史令杨素为行军总管，南下平叛。杨素从京口出发，用兵江浙地区，前后不过一冬，便大获全胜。杨广在江都主持政治攻势，用三吴望族陆知命说降十七城，并派兵攻打皖南和浙西，迅速取得胜利。岭南一带的平叛，则由慕容三藏和奉诏巡抚岭南的裴矩在冼夫人的合作下完成。叛乱的迅速平定进一步巩固了全国统一的局面。而门阀士族的经济政治势力的衰落，五胡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完成，使以往造成国家分裂的社会因素和民族因素归于消失，则是隋朝能够完成统一并遏制分裂反叛的根本原因。

第二节 隋朝的政治

一、巩固统一的文化政策

隋文帝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以北方统一了南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北方强于南方，但是在文化上，南方却比较先进，宋齐梁陈政权也始终以华夏文明的“正朔”自居。为了证明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传人，杨坚在总摄北周朝政之时，就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措施，改 26 年前宇文泰所赐蕃姓，恢复原来的汉族姓氏。立国后第一件政事，是废除宇文氏的六官制度，恢复汉魏以来的传统官制。

隋文帝还致力于恢复传统礼仪，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作五礼。如建社、庙时，左宗庙而右社稷，即按《周礼·考工记》恢复了原位。

他下诏定隋为火德，服色尚赤。制礼必作乐，当时“太常雅乐，并用胡声”，“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①，隋文帝很不满意。平陈后得到流传在南方的遗文旧物，重新确定了华夏正声，开皇十四年（594）诏行新乐。隋文帝对礼乐文明的孜孜追求，是为了表明自己乃文化正统的代表，以便凝聚人心，巩固统一。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十分兴盛，为南北各阶层人们共同信仰，因此也被隋文帝用来为巩固统一、维系人心服务。文帝本人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家庭，周武帝灭佛时，杨坚夫妇庇护过从小抚养杨坚的女尼智仙。杨坚当权后于580年大力复行佛、道二教。即位后一再声称受佛嘱咐，重兴圣教。他在诸州普建大兴国寺，广分佛舍利于全国各地供奉，直接与南方佛教领袖智顓书信来往，被佛教徒众恭维成统治世间的“法轮王”。隋文帝晚年更信佛道，甚至废学兴佛，京师有僧寺逾百，“民间佛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②。使佛教徒以及道教徒众对这位结束法难，使他们重新获得信仰自由的新君由衷地拥戴。宗教在经历了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以后竟被用作支持统一的力量。

隋文帝也注意利用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儒家知识分子，特别是山东士人，如秀才出身的山东士人李德林，其才能受到杨坚的高度赏识。晋王杨广在扬州总管任上，置王府学士百人，搜罗了一批知名的学者，他们来自陈国、北齐和全国各地。借这些声誉很高的文人，为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服务。

二、维护关陇集团的统治

隋文帝在文化上高扬华夏正统的旗帜，以加强全国的凝聚力。在政治上则注意打击门阀士族的势力，维护和巩固关陇集团的统治。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首先，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初步实行科举制度；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并废除地方长官自辟僚属的制度；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通过旨在严密户籍制度的“输籍定样”，“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结果豪族控制下的大批农民转化为国家编户，史称“隋代之盛，实由于斯”^③。

其次，基本保留了北周原来的官员队伍，意在维系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保持核心统治力量的稳定。据统计，隋代三省18名高级官员，有11人曾在北周任职，15人来自西起天水经京畿地区东迄洛阳这条东西向的狭长地带，只有1

^① 《隋书》卷14《音乐志中》。

^② 《资治通鉴》卷175太建十三年十二月

^③ 《通典》卷7《食货上丁中》，中华书

人是南方人，即隋炀帝萧皇后之兄萧琮。六部的 46 名尚书中 42 人是北魏（13 人）和北周（29 人）官员的子孙，只有 3 人有北齐的经历。46 人中的 30 人来自上述狭长地带，7 人来自山西，其余来自华北平原。这是西魏、北周“关中本位政策”的延续，武川系军事贵族居于隋政权的统治核心。

再次，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对地方的统治。诸如分道设行台省或总管府，派诸子和大将坐镇，严密控制河北、河南、西南、淮南等道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发展和改革府兵制度，令军人落籍州县，与编民一样垦田籍帐。

最后，减轻赋役负担。开皇三年将成丁的年龄推迟到 21 岁，力役减轻 1/3，调绢减一半；开皇十年又准许年满 50 者免役收庸；每年徭役的征发一直比较严格地掌握在 20 天的限度内；租额低于北周 2/5，正租加社仓，隋代下户的输粟额大体与唐太宗时正租加义仓的征收额相当；隋文帝还多次蠲免租调赋税，平陈之后，给复 10 年。

隋文帝在历史上以躬行节俭著称，皇后独孤氏对皇子们管得也非常严，不准他们过度奢侈。短短 20 年间，创造了繁荣富庶的“开皇之治”。

三、隋朝的极盛

《隋书》称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仓廩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20 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②。这是魏徵等人对开皇之治的高度评价。《资治通鉴》沿用《隋书·地理志》的论断，把隋代的极盛定在大业五年（609），称：“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於此矣。”那是隋炀帝平定了吐谷浑，广拓西境之时。

文帝最初选定的皇位继承人本来是长子杨勇，杨勇生活奢侈，内宠很多，不为母后独孤氏所喜。相反，晋王杨广却装做一副俭朴的样子，因此为独孤氏所喜爱，“皇后由是薄勇，愈称晋王德行。”^③。杨广又引大臣杨素设计揭露和陷害杨勇。开皇二十年（600），文帝废勇为庶人，立杨广为皇太子。仁寿四年（604）重病的隋文帝在杨素操纵的仁寿宫变中死去，同时废太子杨勇被杀，杨广即皇帝位。是为隋炀帝。

隋炀帝利用从他父亲那里接手的统一国家和大量财富，大张旗鼓张罗国事，营建东都洛阳，同时以洛阳为中心开通南北大运河。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

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77 页。

^② 《隋书》卷 2 《高祖纪下·史臣曰》。

^③ 《隋书》卷 45 《房陵王勇传》。

说，这两项庞大的工程，意义非同小可。它使隋朝中央政府的统治比较便捷地通达于山东和江南地区。北周灭北齐，统一黄河流域时，未能做到这一点；隋灭陈，文帝也没有及时做到这一点。炀帝即位不久就雷厉风行地建东都、开运河，反映了他办事干练的行政作风。



图一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隋炀帝

隋炀帝政治的主要目标及内容，一是为适应旧门阀制度衰落的情况，改革官制和选举制度，在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和自北周以来陆续举“秀才”、“明经”的基础上，创设进士科，确立了科举制，这与确立三省六部行政体制及改革世袭官制一样，为中国中古社会的历史转变提供了制度上的准备；二是安边拓境，刻意消解南北朝时致乱的外部因素，为此总共 10 次征巡吐谷浑、突厥和高丽。还重开丝绸之路，派遣国使四出活动，招徕西域君长来朝，力图使隋朝成为世界性帝国。

第三节 隋朝的灭亡

一、四出巡幸与大兴土木

隋炀帝的好大喜功也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他本人不断地外出巡游，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力役负担。继位的当年他就乘船去江都，此后又两次游江都。两次北行到达突厥部落，出长城，西行到张掖。他在位 15 年，留居京师长安的时间不足一年。在巡游中他极尽奢侈之能事，到江都时的龙船数千艘，拉纤船工有 9 000 多人，都穿锦彩袍，用青丝做缆绳，号称“殿脚”。沿途州县都要贡献食品和珍奇之物，州县官供献丰厚的可升迁，稍不如意即免职以至杀头。

炀帝还大兴土木修建玩乐场所。建造显仁宫时，搜罗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又下令全国各地贡献草木花果和奇禽异兽。在洛阳西部修造西苑，周长 200 里的苑内有人工海，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有许多亭台楼阁，海北有龙麟渠流入海中，渠两旁有十六院，极尽工巧之能事。甚至苑中的花草秋冬凋谢后，用彩绸剪成花叶加以装饰，池沼中也布满绫制的荷花。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搞得国库匮乏，民众贫困。

二、征伐高丽和开凿运河

给隋朝造成严重社会危机的还有征伐高丽的战争和开凿运河的繁重徭役。高丽也称高句丽，汉晋以来被视为华壤故地，隋文帝封其主为高丽王。开皇十八年，高丽王高元兵犯辽西，隋文帝派汉王杨谅、高颎、王世积率水陆 30 万将士征伐。由于高丽自隋军平陈后，便治兵积谷，早有防备。隋军劳师远征，馈运不继，加上疾疫流行，水军在海上遭遇风暴，船只多被飘没，无功而还。高丽王高元连忙遣使谢罪，算是给了文帝一个罢兵的台阶下。

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时，警惕地发现突厥启民可汗处有高丽王使者的活动。于是采纳裴矩的建议，要高元入朝。高元不从，炀帝决定出兵讨伐。大业八年第一次亲征高丽。出动左、右各十二军及沧海道水军舟舳千艘，目标直取平壤。高丽军队在辽水、萨水（大同江）节节狙击，坚城死守。隋将作战必须请示皇帝，一再贻误战机。结果食尽师老，转输不继，大败而退。

大业九年再次亲征，来护儿自东莱率水军出沧海道。这次敕准诸军便宜行事，诸将分道攻城，高丽形势危急。不料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境）督运的杨玄感起兵作乱，掌握军事机密的兵部侍郎斛斯政叛逃高丽，迫使隋炀帝仓促退兵，高丽兵紧蹙追击，重创隋军。次年炀帝竟然又发动第三次征辽战争，此时全国战乱风涌，人多流亡，形势危如累卵。隋军大多不能按期集结进军。这

时，高丽经连年作战也困弊不堪，乃遣使向隋军乞降。隋炀帝同意退兵。事后高元仍然不肯入朝，炀帝还想举兵再征，终因天下大乱而作罢。

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时渠道，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今北京），南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共分为 4 段：一是通济渠，从洛阳西引谷、洛二水到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入汴水，又从开封以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通于淮河。二是山阳渎，自淮安引淮河，绕扬州、仪征入长江，即原来吴王夫差开的邗沟，此时加以疏扩三是江南河，从京口引长江到余杭这三段组成运河的主体航线，主要用于从江南往关中漕运粮物。四是永济渠，引沁水达黄河，北到涿郡，专为对高丽作战而开凿。

征伐高丽与开凿运河同时进行，繁重的兵役徭役使百姓难以负担。如第一次征高丽时出动军队“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①，至少有 300 余万青壮年脱离农业生产。开运河时，动辄征调沿河民工 200 万。这样，大业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数百万丁壮离乡服役，甚至丁男不够用而役及妇女，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加之隋朝后期山东、河南一带水灾不断，疫病流行，人口和牲畜大量死亡，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三、长白山起兵和杨玄感叛乱

无穷无尽的劳役和年复一年的征伐高丽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不堪忍受的灾难。人们甚至自残手足以逃避兵役，称为“福手福足”。同时，隋文帝和炀帝父子杀戮功臣的政策，特别是隋炀帝一意孤行的作风和削弱贵族特权的措施，使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严重的离心倾向。于是，下层人民的反暴起义和上层集团的起兵反叛，交织在一起。

首先是《无向辽东浪死歌》的作者王薄，于大业七年（611）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武装反对征辽战争。反抗者的势力逐渐从山东、河北向江南发展，蔓延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广大地区，“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②。起先隋炀帝还不太在意这些反抗势力，仍旧连年发兵进攻高丽。大业九年六月，为前线督运粮草的杨玄感纠集 40 余名达官子弟在黎阳起兵，从者 10 万人。隋炀帝丢弃全部辎重，连夜从辽东撤军回来镇压。

杨玄感是已故权相杨素之子。隋炀帝曾说：“使素不死，终当夷族”^③。杨玄感衔恨在心。他看到全国各地反战呼声高涨，打出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

^① 《隋书》卷 4 《炀帝纪》。

《资治通鉴》卷 183 大业十二年十二月。

《资治通鉴》卷 182 大业九年四月。

救黎元之命”^①的旗号，利用一批被削夺了世袭特权的达官子弟的不满情绪。但是，在战略上他拒绝了李密提出的长驱直入扼隋炀帝攻辽军队退路的上计和鼓行而西直取长安的中计，偏偏采用了袭取东都的下计。结果如李密所预料，与已有准备的隋军相持一个半月，仍然攻不下东都。杨玄感乃引兵入关，却从前线撤回的隋军紧蹙于后，终于在弘农（今河南灵宝北）、阆乡（在今河南）一败再败于隋军。八月败亡于上洛（今陕西商县）。

四、义军蜂起和江都宫变

杨玄感叛乱使隋炀帝觉得“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②于是更加疯狂地屠杀无辜百姓，连杨玄感在东都开仓放赈时受米的百姓都被坑杀。炀帝又倒行逆施，下诏“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结果断了生计的人们大都涌进了造反的队伍，在黄河南北和江淮地区陆续汇成三大义军。

一是瓦岗义军，杨玄感失败后逃脱了官军捕杀的李密，在大业十二年（616）上了瓦岗寨（在今河南滑县境），投奔在此聚众造反的翟让。李密设计破金堤关，消灭张须陀，攻占兴洛仓，连战大捷，开仓散粮。瓦岗军众至数十万，成为声势最大的反隋武装。大业十三年二月，翟让把寨主的位置让给了李密，推戴他为魏公。二是河北义军，农夫出身的窦建德收集战败的孙安祖、高士达余部，优待归降的士人和隋官，在河北发展到 10 万余人，大业十三年正月称长乐王，在河间乐寿（今河北献县）建立了政权。窦建德接连取得清河、河间大捷，打败隋将杨善会、薛世雄。三是江淮义军，江淮军的基础是大业九年自山东南下的几支造反队伍，被杜伏威用武力统一了起来。大业十三年正月杜伏威击败陈稜，在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以辅公柝为长史，也建立了政权。

隋朝末年参加反隋义军的主要是大批逃避征役的农民和逃避战争的兵士，还有众多的奴婢、盐户、渔猎手、士人、僧道、商人、地主和官吏，门阀旧族乃至关陇集团上层最后都有卷入者。对于隋室来说，几乎到了“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的地步^④。隋炀帝生性高傲，不耐烦别人谏诤，更“恶闻贼盗”。最后回天无力时，萧皇后命左右的人不必向皇帝报告谋反的事，徒令皇帝忧烦。整个局势完全失控了。

^① 《隋书》卷 70（杨玄感传）。

^② 《资治通鉴》卷 182 大业九年八月。

^③ 《隋书》卷 4（炀帝纪）

^④ 《隋书》卷 4《炀帝纪·史臣》

大业十三年四月瓦岗军发表讨隋炀帝檄文，标志着与官军进入决战阶段。五月李渊趁势在晋阳起兵，半年后袭取长安。在江都的隋炀帝终于认识到大势已去，沉湎酒色，放纵玩乐。一批不满隋炀帝重用南方籍人及南朝旧官、又滞留江南不归的北方将领，拥戴关陇军事贵胄宇文文化及，以北归为号召，煽动家在关中的从驾将士反叛，大业十四年（618）三月，缢杀隋炀帝于江都宫西阁（在今江苏江都县）。隋朝灭亡。

第四节 唐朝的建立与政权的巩固

一、李唐的先世与晋阳起兵

李唐祖上原籍赵郡（今河北高邑西），属于山东望族李家的一支。李渊的祖父李虎在西魏时立有战功，是“八柱国”之一，封唐国公。宇文泰为推行“关中本位政策”^①，把关中一带作为华夏文明的源头，以抵消山东、江南汉文化中心影响，将西迁功臣的郡望全部改成了关内，此后，李虎才自称祖籍武川（今内蒙武川东北）了。从母系来看，李氏有与西北游牧民族通婚的传统，李渊的父亲李昞娶独孤氏，李渊娶窦氏，李世民娶长孙氏，都是当时所谓“胡人”之女；并且，李昞与宇文泰的长子周明帝宇文毓、隋文帝杨坚是“联襟”关系，李世民的外婆是宇文泰的长女襄阳公主。这种传统的通婚方式不仅使李氏的后代在心智和体魄上得胡汉通婚的优化组合，而且在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中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在这个特殊的集团中，已经出过建立西魏、北周和隋朝的家族，此时，袭封唐国公的李渊与其子李世民，又趁隋末战乱造成的机遇，藉手握重兵留守晋阳（今山西太原）的机会，准备建立自己的新王朝了。

李渊对此已有长期的准备。早在他去涿郡料理元配夫人窦氏的丧事时，就曾与军将宇文士及深夜秘谈，但时机不成熟，没有贸然行动；当时杨玄感举兵，果然迅即败亡。而后窦抗、夏侯端、许世绪、唐俭、武士彠等都曾劝说李渊趁隋乱起兵图天下，隋炀帝也有所察觉。李渊为了掩盖自己的野心，便纵酒纳贿以自污，炀帝见其无大志向，便放松了警惕。到李密进攻东都洛阳时，道路隔绝，隋炀帝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隋朝灭亡已成定局，李渊才不失时机地在大业十三年五月捕杀隋炀帝派来监视自己的王威、高君雅，在晋阳起兵。在谋划起兵过程中，李渊的次子、年仅 18 岁的李世民密招豪友，积极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三联书店，1956 年版。此处关于李唐先世的叙述亦据此篇。

二、唐朝的建立

晋阳起兵的李渊，以取隋而代之为目标，但南下攻取长安时，背后有控弦数十万的突厥虎视眈眈，左掖有瓦岗军近在洛阳，不处理好这两个方向的战略关系，会三面受敌。李渊只有 3 万兵力，无法多方作战，于是制定了臣服突厥和安抚李密的战略。

突厥自大业五年启民可汗去世，始毕可汗继位起，便与隋失和。大业十一年始毕可汗围攻隋炀帝于雁门，关系恶化。始毕可汗接李渊手书后表示，只有唐公自作天子，推翻隋朝，才给与支持。李世民、刘文静掌握的兴国寺屯兵也闹事，胁迫李渊服从突厥。于是李渊遣刘文静出使突厥，约定“与可汗兵马同人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实际是称臣于突厥^①，以换取军事上的支持。八月，突厥派来 500 士兵和 2 000 匹马，合乎李渊多要马少要兵的方针，这样可以预防将来对入援的突厥兵失去控制，又达到了借突厥兵马为自己张大声势的目的。

瓦岗军是另一个要妥善处理的对手，不仅要避免更生一敌，还要利用其来牵制洛阳的隋军。李渊致书李密时“卑辞推奖”，说希望李密“早应图策”，自己“攀鳞附翼”，只求“复封于唐”。哄得李密高兴，以为“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②，一心去对付王世充。李渊因而得以专意进攻关中。

七月，李渊留第四子李元吉守太原，自己与分领左右军的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率军南下，克霍邑（今山西霍县）、绛郡（今山西新绛）后，对河东坚城围而不攻，主力渡黄河占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和永丰仓（在今陕西大荔县境）。十一月，李渊在其女儿（后封平阳公主）所率娘子军策应下攻取长安。沿途攻战取胜时，李渊以矢石之下不辨贵贱的道理，命给奴与良人同样的勋赏。对想回家的军士给五品散官，以礼相送。还宣布约法十二条，悉除隋朝苛禁。不仅因此得到许多奴军、农民军的参加，还收纳了李孝常、于志宁、颜师古、令狐德棻、房玄龄等一批隋官，连曾告发李渊在晋阳密谋起兵的李靖和在绛郡守城抵抗过唐军的陈叔达，被俘后也都予以重用，因而获得了“仁义之师”的美誉。

李渊占领长安后，仍不放弃尊隋旗号，立炀帝长孙代王杨侑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自己以大丞相、唐王身份视事主政。大业十四年（618）三月炀帝被杀，五月恭帝杨侑逊位，李渊登基。自晋阳起兵仅一年，便建立了大唐王朝。

^① 《旧唐书》卷 57 《刘文静传》。并参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载《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 97 页。

^② 《旧唐书》卷 53 《李密传》

三、唐初的统一战争

隋末大乱以来，南北国土处于数以百计的武装力量的分割占领之下。唐初统一战争的三个阶段性目标，是稳住关陇，控制中原，克定江南。

秦王李世民负责整个黄河流域的战事。武德元年（618）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薛仁果进犯扶风（今陕西凤翔）和泾州（今甘肃泾川）七月唐军出战时，因轻敌大败，折损兵将十之六七。年末再战时，唐军坚守高土庶城（今陕西长武），60余天高挂免战牌。待敌疲后出击，一举击败，李世民马不停蹄率轻骑抢先赶到敌据点折土庶城（在今甘肃泾川东北），使溃退的敌军进不了城，散归陇外。此时薛举已死，薛仁果计穷投降接着于武德二年，李唐利用西域胡商领袖安修仁擒获了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称帝的李轨。而后唐军的作战方向转向河东。

自李渊从晋阳南下后，代北的刘武周和宋金刚勾结突厥大举南攻，袭占太原，兵犯晋南。武德二年十月，李世民率军东渡黄河，先在晋西南与敌对峙五个月不与决战，却派兵坚守敌后的浩州（今山西汾阳），阻断其粮道，迫使敌军北撤。唐军乘势反攻，一昼夜追击200余里，打数十仗，敌军溃散，宋金刚、刘武周都被突厥斩杀。唐军收复晋阳，拓地至代北。著名的《秦王破阵乐》描写的就是李世民在这一仗中两日不食、三日不解甲的勇猛神武形象。

关陇和河西、河东心腹肘腋之地稳住以后，唐军自武德三年起东进中原，与洛阳的王世充和河北的窦建德决战，仍由李世民统帅。

此时中原的形势，已因宇文化及两年前弑炀帝后率十余万众北上而剧变。越王杨侗在东都称帝后招李密为太尉，李密的瓦岗军虽挫败宇文化及，但自己劲卒良马损伤过多，败于王世充，不得已而降唐，李密旋即被害。宇文化及则被窦建德擒杀。武德二年以后，在东都废杨侗自立、定国号为郑的王世充和迁都治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定国号大夏的窦建德，分别控制着大河南北之地。武德三年唐军来攻洛阳，鏖战八个月，窦建德怕王世充覆灭后自己成为唐军下一个目标，于武德四年三月亲自统兵10余万援救王世充。李世民围城打援，往虎牢迎战。五月，诱窦军出击，待其疲困后，李世民以优势骑兵突袭敌军，窦建德被俘，王世充投降。李世民一战而克二敌，黄河流域战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是武德四年七月窦建德在长安遇害后，其旧部刘黑闳两度起兵，尽复故地。李世民单纯的武力镇压无效，太子建成采纳魏徵建议，改变严厉强治政策，农民军散归家乡，刘黑闳于武德六年被俘杀，河北才安定下来。

在江淮的杜伏威于武德二年降唐，五年入朝长安。六年，留守辅公祐在丹阳举兵反唐，七年被执杀。杜伏威已先于他被害于长安。江南也平定了。

四、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武德七年（624）平江南以后，高祖诸子之间谋夺储位的争斗日渐激烈。武德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兄弟二人被杀。不久，李渊退位，李世民继位，是为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

唐太宗继续实行唐高祖确定的各项基本政治制度。他总结了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真切地认识到国君好比是舟，人民好比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为政比较谨慎。他鼓励臣下指陈君主过失，开怀纳谏，目的是避免政治上的过失。他懂得澄清吏治的重要性，注意精兵简政，重视刺史、县令等“亲民之官”的人选，使贞观时期的政治比较清明。农民也能在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安心生产，度过了贞观初年的经济困难。他还对少数民族采取不歧视的开明政策，使胡汉各族相安共处。

唐太宗善于用人，秦王府的十八学士，皆一时之人杰。太宗继位后文臣有房玄龄谋划，杜如晦决断，武将有尉迟敬德、秦叔宝，忠心耿耿。贞观名臣魏徵曾在瓦岗军中为李密掌书记，归唐后在太子建成宫中任洗马，预见到建成与世民兄弟俩将互不相容，曾劝太子建成早除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信任和重用魏徵，官至宰相。魏徵以直相报，知无不言，贞观初即陈谏二百余事，至贞观十一年和十三年，更连续上疏陈“十思”，批评唐太宗比贞观之初有十条“渐不克终”。

唐太宗晚年的政治已经不如即位前期，显得有些刚愎自用、志得意满。贞观十八年（644）起三度征高丽，明明是劳师远征，却妄称以逸待劳，必胜在握。同时还对焉耆、薛延陀、龟兹、松外蛮、中天竺用兵。他认为太子李治仁弱，急于替儿子解决周边的安全问题。此外，还大兴土木，营缮陵墓宫殿。长孙皇后和徐贤妃一再劝谏，他只是表面善其言实际不听。房玄龄为相 22 年，临终上表谏阻征高丽，他也不听。还对魏徵起疑心，令人扑倒磨去自己为魏徵作的刻石碑文。早年他曾打破关陇地域局限，信用了一批山东士人，晚年竟冤杀了张亮、刘洎等极有才能的宰臣。连倚为“长城”的李靖也被置于生杀线上考验，若稍有不顺，就准备处死。最后只信任他的妻舅长孙无忌等少数亲信和一些一味逢迎吹拍的佞幸。贞观治世的光彩暗淡了。

第五节 从永徽到开元

一、永徽朝政与武则天的崛起

唐太宗 14 个儿子中，皇后长孙氏嫡出 3 个：长子承乾，立为皇太子，然

后是魏王泰和晋王治。晚年为皇位继承人的事颇费脑筋。太宗宠爱魏王泰，引起承乾的恐惧，害怕有废立之事，魏王泰也恃宠与太子争位，两人互相倾轧。太宗将二人全部放弃，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仅 50 周岁的唐太宗病逝，李治继位，改元永徽，是为唐高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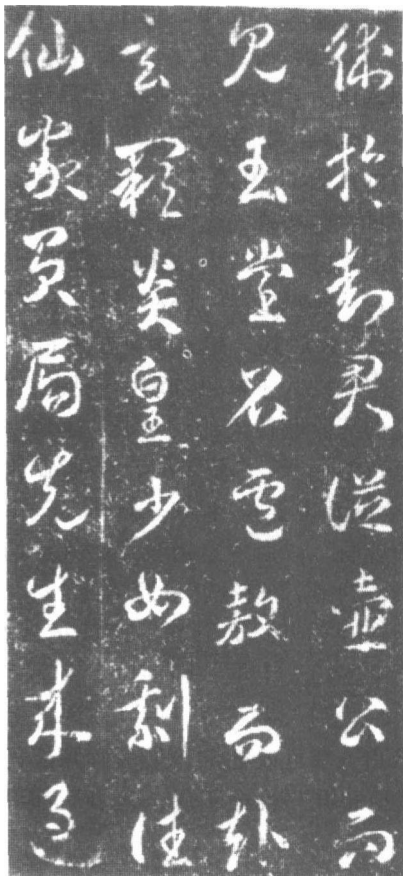
唐高宗正式登基之前，即以唐太宗遗诏形式宣布停止征伐高丽的辽东之役和一切土木工程。总体上看，永徽之政是“贞观之治”的继续，永徽时期的文臣武将都是贞观旧臣，所以史称永徽之政有贞观之遗风。唐高宗时期，全国人口在继续增加，经济在进一步发展。在对外关系方面，东灭高丽和百济，西败西突厥，在葱岭以西地区置波斯等 16 个都督府，发展了唐朝对中亚和辽西地区的关系。

永徽年间，掌握朝廷大权的是高宗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与另一位顾命大臣宰相褚遂良。长孙无忌先世是北魏宗室王，有五世在西魏、北周、隋、唐政权中居高官显爵，从而使他成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以国舅自居，大权在握，隐伏了君相之间的矛盾。引发这个矛盾的是武则天。

唐高宗的元配王皇后，是西魏大将军王思政的嫡孙女，舅舅柳奭当朝为相，又有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的维护，本来在后宫的地位是稳固的。但武则天来到唐高宗身边，王皇后的地位受到挑战。

武则天名曩，族姓卑微，出身山西文水的商人之家。父亲武士彟与李渊有旧，太原起兵后跟随入长安，官居工部尚书，成为大唐新贵。武则天年 14 时被唐太宗召入宫中为才人，是掌管寝食琐事的低级女官，十余年未得升迁。唐太宗死后与其他没有生育的后宫女官一起被送入尼姑庵。唐高宗李治为太子时与她有私情，永徽初将她再度接进宫，立为昭仪，独占了房帷之宠，接连生下多个子女。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以皇后无子为由，提出改立昭仪为皇后。长孙无



图二 武则天手书（升仙太子碑拓片）